

轉型期中國的 性與性別

方剛 著

Sexuality and
Gender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
in Mainland China Today



潘綏銘·主編

中國*sexuality* 研究系列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主辦


轉型期中國的 性與性別

方剛
著



潘綬銘·主編
中國*sexuality*研究系列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主辦

本書獲福特基金支持

 香港大道出版社

書 名：轉型期中國的性與性別

作 者：方 剛

出版發行：香港大道出版社

出 版 人：李松樟

香港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48 — 52 號
裕昌大廈 502 室

電 話：00852-28698526 13902963159

印 張：9.5

開 本：1194mm × 889mm

承 印：新域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一次出版 第一次印刷

國際書號：ISBN 988-98037-8-X

定 價：港幣 88.00 元 人民幣 80.00 元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目錄

當前中國多性伙伴行為者與社會控制關係的個案研究	1
傳統權力向現代權力的轉型：私人性行為視角的觀察	
——福柯權力理論的應用與擴展	54
兩個特殊家庭及其生活方式的個案分析	
——福柯思想和酷兒理論的應用與擴展	65
走進天體沙龍	
——全參與觀察法的實踐與反思	84
發出她們自己的聲音	
——女性主義人類學雜談	97
社會分層與流動研究對性社會學的啓示	104
城鎮職業女性弱勢地位與相關社會政策的思考	117
潘光旦性學思想的中庸性分析	130
男人性障礙與Sexuality理念在中國的普及	139
玩具·符號·機器·誘餌	
——壯陽藥廣告中的小姐形象	162
基因制衡一切？	
——看生物本質主義對人類性行為的解讀	174
馬林諾夫斯基的性愛與婚姻	190
賈寶玉：階級與社會性別角色的雙重叛逆者	201
系統中的性	
——以功能主義眼光看社會系統中私人的性	216
個案研究的優勢與局限	230
社會控制與對性的社會控制(文獻綜述)	243
附：英文論文二篇	
PRACTITIONERS WITH MULTIPLE SEXUAL PARTNERS IN MAINLAND CHINA TODAY: CASE STUDY FROM SOCIAL CONTROL PERSPECTIVE	270
CASE STUDY OF THE MARGINALIZED GROUP'S MARRIAGE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284
后記	296

Practitioners with Multiple Sexual Partners in Mainland China Today: Case Study from Social Control Perspective	1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 power to Modern Power: Interview from individual sexuality Perspective	54
A Case Study on Two Special Families and Their Lifestyles: Application and Supplementary of Foucault Ideology and Queer Theory	65
Coming into Nudism Club: Practicing and re-thinking on Participate Observation	84
Reviewing Gender Perspective From one Book: Re-thinking on Feminist Anthropology	97
The Inspiring on Sex-sociology from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104
Opinions on the Vulnerable Status of Urban Working Women and the Related Social Policies	117
The analyze on Middlebrowlity of Pan Guang Dan's Sexology Thought	130
Male Sexual Disability and the Spread of Sexuality Thought	139
Toy, Symbol, Machine and Bait: Analyze on Sex-worker Behave in vigorad.	162
Gene decided every thing?Oppugn on Biological Essentialism	174
The views on sexuality and marriage of Bronislaw Malinowski	190
Jia Bao Yu: the Traitfor of the Class and the Gender	201
Sexuality in System	216
The Value and Shortcoming of Case Study	230
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Control on Sexuality	243
Attachment: Two English Papers	
Practitioners with Multiple Sexual Partners in Mainland China Today: Case Study from Social Control Perspective	270
Case Study of the Marginalized Group's Marriage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284
Postscript	296
Fang Gang s E-mail:fanggang@ruc.edu.cn	

當前中國多性伙伴行爲者 與社會控制關係的個案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1節 問題的提出

中國社會正處於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轉型期，在這一過程中，社會控制面對諸多挑戰。傳統的社會控制手段已不適合轉型社會的要求，社會控制在許多方面呈現解體迹象。對社會控制的解體情況進行研究與反思，對於處理好社會轉型期社會控制與個人自由的關係無疑將具有重要的啓發意義。而多性伙伴行爲者，則是針對社會控制“違規”的一個特殊而極端的人群，對他們與社會控制關係的研究，無疑是考察社會控制解體情況的一個很好的視角。

中國傳統文化對私人性行爲的社會控制一向十分嚴格(潘綏銘, 1995:2-31)。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着社會轉型，





中國人的非婚性行爲越來越多，中國開始出現所謂的性革命（潘綏銘，1995：546-552），“多性伙伴行爲者”才開始成爲一個新鮮概念。但是，中國的性革命是潛在的，地下的，遠未表現出西方性革命運動中的轟轟烈烈。同樣，多性伙伴行爲者也是隱秘的。

對於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一生只有一個性伙伴（配偶）是很正常的，多出一個（情人或其他）便頗奢侈了。1989年2月至1990年4月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一項非隨機抽樣調查顯示，除配偶外另與一人發生過性關係的，城市爲4.4%，農村爲4.5%（劉達臨，1995：209-210）。在經歷了社會轉型的十年之後，潘綏銘主持的于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進行的針對全國20-64歲總人口的分層隨機抽樣調查表明，中國多性伙伴行爲者出現了增多的趨勢。確實有過婚外性行爲的，女性爲5.1%，平均有過性伙伴人數爲2.5，男性爲21.2%，平均有過人數爲4.2%。潘綏銘等人據此總結說：“婚外性行爲在中國正在增加，而且速度很快。尤其是在城市男性中，假如一直以目前的速度持續發展的話，那麼每10年就會增加20%還多的發生可能性。”（潘綏銘等，2004：270）

由以上數字可以看到，今天中國社會多性伙伴行爲者日益增多，但是，仍然是少數。對於大多數公眾來講，如果告訴他們某個人曾與十幾個，甚至幾十個、上百個人發生過性關係，他們都會驚异地張大嘴巴。

因此，對於這一群體的考察，無疑最有助於解讀社會控制與私人行爲之間的互動關係。社會控制在多性伙伴行爲者身上是否還存在？如果社會控制對多性伙伴行爲者已失去效應，那麼，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它們與多性伙伴行爲者之間是怎樣的互動關係？進一步，這對我們理解當今中國的社會轉型有哪些幫助？這些都是本研究的動機。

需要說明的是，社會轉型前，中國也一直存在多性伙伴行

為者，這與社會轉型後多性伙伴行為者的區別在於：前者是違規的，是受社會干預與處罰的，當事人要小心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而後者則不再成為社會干預的對象，當事人甚至會以此為榮，其行為處於半公開狀態。由前者到後者的變化，正是本研究所感興趣的。

第 2 節 以往研究中的多性伴侶現象

英語學術圈對於多性伙伴的研究已經極多，但能夠檢索到的多是抽樣調查的定量研究，這些研究主要是報告多性伙伴行為者特點的，關於他們與社會控制關係的個案研究及論述，則相對較少。

這些研究顯示：青春期青年比成年人更多報告有多性伙伴情況 (Forrest and Singh, 1990)，在青春期中女性中比青春期中男性中更多報告多性伙伴情況 (Smith, 1991)；男性有衆多性伙伴的可能性比女性大得多；成年人一般在二十來歲的時候積累數目最多。西班牙男人中報告有多性伙伴的是女人的五倍，其中沒有結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有高收入的人居多。西班牙人強調男性氣質的驕傲感，這被認為可能是促成性伙伴多的原因，“玩女人”，嫖娼，都符合“好男人是女朋友最多的人”這樣的傳統觀念。女人中的多性伙伴者也是年輕的，未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 (Sabogal, Fabio, Faigeles, Bonnie, 1993)。

1988 年對美國全國的一份家庭調查數據被多項研究應用。研究表明，在 15 至 44 歲的女性當中，那些多性伙伴行為者更多是第一次性行為發生比較早的、年齡不到 30 歲的、沒有結婚的、生活在城市的，收入在高出最低貧困綫兩倍以內的，在外工作而非隨父母居住居的，沒有宗教信仰的。沒有結婚的青少年在他們 20 多歲的時候更多地擁有性伙伴。(Binson, Diane,





Margaret, 1993; Dolcini, 1993) 從中，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社會控制與多性伙伴行為者的關係。

研究顯示，結婚女性比未婚女性在過去三個月中的性伙伴數少，結婚男性也是一樣。14 歲之前便發生首次性關係的男性的性伙伴數，是 16 歲或其後發生首次性關係的男性的 2 倍。第一次性生活早對個人性伙伴數的影響，在女性身上比男性身上更明顯 (Santelli, Nancy, Lowry, Richard, Laurie, 1998)。

還有的研究涉及種族和宗教問題，它們揭示出，白種女人和黑種女人在多性伙伴問題上沒有差別。在美國西部出生的，更多多性伙伴者，因為那裏的宗教感差。未婚女人中，她們的母親在 17 歲至 24 歲生育第一個孩子的，比那些母親在 24 歲之後生育的更多是多性伙伴者。母親全天在外工作的女性，比母親半天工作或不外出工作的女性，多性伙伴者多出 53%。(Edwards, 1994)

4 羅伯特·邁克爾等人指出，“人們現在之所以有更多的性伴侶，是由于他們既有性活動又處於單身狀態的那段時間被大大拉長了。人們開始第一次性交的平均年齡一再降低，而他們第一次結婚的平均年齡又不斷上升。同時人們現在離婚的可能性也增大了。這就意味着在離婚和再婚這段時間裏，他們必須尋找新的性伴侶。”(羅伯特·邁克爾等，1996: 142)

少數研究強調多性伙伴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如認為多性伙伴行為會引起社會的功能紊亂、性傳染病，以及社會暴力 (Immerman, Ronald, Mackey, Wade, 1999)。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多性伙伴者堅拒使用安全套，使得性傳播疾病的預防變得困難。

中國的相關研究只有潘綏銘等人對全國隨機抽樣獲得的多性伙伴情況進行的分析。其中，性別差異，階層差異，文化差異等等，同樣成為重要分析視角。“在每月收入最高的那 5%

的人裏，有45.1%有過婚外性行爲。可是在每月收入最低的那40%的人中，却只有5%的人有過婚外性行爲。”（潘綏銘等，2004：269）“婚外性行爲最多的是上過大專的男女（27.6%–29.9%）和上過高中的男女（24.3%–25.4%）。可是大學文化以上和只上過初中的人，有過婚外性行爲的却少了將近一半。……從表面上來看，婚外性行爲主要是那些念書不多不少的人們的事情。但是，這其實並不是文化高低的問題，而是機會多少的問題。上學太多就容易眼光高，減少了選擇的機會，而不上學則幾乎沒有機會去選擇。”（潘綏銘等，2004：271）

對有過21個以上的性伙伴的人的分析顯示，“他們全部是男人，年齡中位數是30歲半，文化程度主要是初中和高中，幾乎都不是黨員（指中國共產黨黨員），個人收入在中等以上，以商業服務業、娛樂業和個體勞動者居多，主要是初婚者，主要居住在大城市裏，單獨外出時間和平時的社交頻率幾乎都在中等以上，沒有一個身體不太好的，基本上都認為自己的魅力比較大和很大，尤其是性觀念的開放程度都在中等以上。”（潘綏銘等，2004：260–261）

潘綏銘還指出，多性伙伴現象並不是一種階層化的行爲的產物。“自己可能不可能發生多伴侶性行爲，是女性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基本價值觀。在它面前，現有性愛的好壞、周圍人的潛移默化、性的生物狀況等等雖然也在發揮着作用，但是其作用強度却相對地小得多。”（潘綏銘，2002）

正因為以往的研究都是調查統計的定量研究，而缺少深入的個案研究，所以，為本項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擴展空間。而且，雖然某些定量調查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多性伙伴行爲者與社會控制的關係，但都無法深入地分析，為什麼在絕大多數人仍“循規蹈矩”的情況下，少數人却可以有很多的性伙伴，他們與社會控制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抽樣統計顯然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第3節 重要概念的界定

多性伙伴行爲者：

本項研究中的“多性伙伴行爲者”的定義是：到接受訪談之日有過不少於10名性伙伴的人士，這10名性伙伴當中可以包括同性，但不能只是同性。而對性伙伴的定義爲：即使只有過一次性關係（陰莖插入陰道或肛門的性行爲），包括嫖娼行爲，也算作一個性伙伴。

之所以將性伙伴數界定在大于等于10人，是因爲潘綏銘等人進行的全國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中國人口中有10個以上性伙伴只有0.7%。利用其極端性，更便于我們研究他們與社會控制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將只以同性爲性對象的多性伙伴者排除在外，是因爲作爲一個特殊的亞文化群體，他們面對的文化、輿論環境，以及社會控制機制都更爲復雜。而作爲一個小型研究，本研究無法涉及到太多的變量。

在我們前面提到的所有中文研究文獻中，對同樣的研究對象使用的均是“多性伴侶行爲者”這個稱謂，考慮到“性伴侶”在中國人的語匯與思維中有“長期”、“固定”的含義，而我們的研究包括性交易關係與“一夜情”式的性關係，所以筆者以爲“性伙伴”一詞似乎更爲確切。

社會控制：

社會控制是指一個社會的統治者，以社會組織體系爲中介，運用社會規範以及與之相應的手段和方式，對社會成員（個人、群體、組織）的社會行爲及價值觀念進行制導和約束，對各種社會關係進行調節和制約的行爲，其目的是使社會按符合統治者利益的規則運轉（羅斯，1988）。

關於社會控制的類型，有許多不同的定義，但都承認非正

式控制和正式控制的存在。非正式控制又稱軟控制，主要依賴同齡群體、家庭、朋友、同事以及其它對個人發生作用的群體的影響，這些群體帶給個人強大的壓力，個人害怕被拋棄、被羞辱，或者去尊重，所以要遵循群體規範；正式控制又稱硬控制，是官方的決定以及體系的建構所決定的，它的效果小於前二者，但仍會對個人的行為構成影響，其控制手段主要是獎勵與懲罰。

受採用的研究方法限制，同時考慮對私人人性行為的正式控制在轉型期中國的逐漸解體已有目共睹，本研究將考察目標主要集中在非正式控制。

特別需要強調說明的是，本研究中所說“社會控制的解體”，均指針對私人人性行為的社會控制的解體，與其它方面的社會控制無關。

社會控制組織：

本研究關注的社會控制組織，主要是：家庭、社區、工作場所。

美國的研究顯示，直接影響着美國社會性觀念與性行為的兩個重要組織是宗教和家庭，害怕被制裁是組織成員遵紀守法的一個重要原因（DeLamater, 1981: 263）。還有的研究將社區也納入其中。

當我們討論中國的社會控制的時候，可以忽略宗教這層因素，因為宗教的影響在中國一直很弱。但是，本研究中加入了“工作場所”，特別是“單位”意義上的工作場所這一中國的獨特組織，因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人的單位不僅將人們的職業行為管理起來，還將人們的全部生活管理起來。

第 4 節 主要應用理論

本研究主要應用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對性的社會控制進行研究。



社會交換理論認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回報的，人們都想利益最大，支出最小。付出多而得到少的關係總會終止，而得到多的關係會維持。因此，社會規範能夠作為個體利益的後果而產生。之所以會存在社會控制，因為受控制者從控制中獲利，遵守和服從社會控制對受控制者有利。如果與個人利益相左，社會控制就會受阻。

埃默森明確指出交換理論三條獨特的核心假設 (Emerson, 1981):

1. 人們會(經常或一直)理性地行動，爭取收益(即價值、效用、報酬或工資等)最大化;

2. 各種物品的價值是可變的，它們全都遵循着滿足原則，又稱價值調適原則。獲得越多，自感價值越低;

3. 個體在社會互動中得到的收益取決於個體向其他人提供的利益。為了得到利益，必須有一個交換過程，這個過程本質上是社會性的、流動的。因此，可以把社會理解為一個利益流動的網絡。

霍曼斯指出，投入足夠的資本，並從投資中產生回報，是社會控制存在的邏輯。構成資本的必定是些一般性的強化刺激，諸如貨幣、社會認可，或對暴力手段的控制。投入越多，相互依存的鏈條就越精細，網絡中的角色就越專門化，相互依靠的水平就越高，所以遵從將網絡維系在一起的規範或權威性要求的傾向也就越強。在任何情況下，如果初始投資者和使之維持的參與都不能都獲得回報，就不會發展出任何制度(馬爾科姆·沃特斯, 2000:77)。

布勞認為促使往來聯系形成的力量就是社會引力。一旦確立起相互之間的吸引，社會交換也就開始了。當一個人在交換中處於匱乏境地時，就有這種可能，從而只有使自己服從他人，才能使交換維持下去。他人可以獲得一種權力信用，也就是一種可用于以後交換的命令權力。所以，如果說某些人為他

人所依靠，那么，在這個意義上，這些人就是富有權力的。（馬爾科姆·沃特斯，2000：79）

交換理論提出了許多命題，與此項研究關係密切的如：

當與其他人互動的時候，人們都在尋求使自己收益最大，付出最少；人都是理性的，他們會在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的情況下，權衡付出與收獲，從而在行動前思考選擇哪種方式；社會交換被互惠標準所調節；關係中互動的動力，以及長時期關係的穩定性，取決於關係中的當事人對吸引與依賴水平的對比。

社會控制實質上是對人們利益關係的維持，只有當控制行為調整到能够被受控方接受的狀態時，社會才會穩定（李平安，1987）。社會干預的每一增加給作為社會成員的人帶來的利益應大於它對作為個人的人引起的不便，社會控制應該“給予我們最多的福利而最少地剝奪我們的自由。”（羅斯，1988：318-324）

第 5 節 研究方法

1. 材料獲取方法

本研究以深入的個案訪談為研究方法，重點引導被訪者回溯對社會控制的解構過程，這種解構得以實現的客觀原因，個人違規背後的心路歷程，以及違規的個人是如何與傳統的社會控制機制進行博弈的。

研究對象的獲取主要通過兩種方法：

第一，由熟人入手，進而採取滾雪球的方法。首先從我已經掌握并熟知了一些多性伙伴行為者（包括研究者的熟人和朋友）入手，他們在接受訪談後再介紹他們的朋友接受訪談。

第二，在互聯網的 BBS 上公布征求支持此研究志願者啓示，訪談那些主動發信給我表示願意支持此研究的志願者。特別需要說明的是，他們很多人是我“讀研”前當作家時的熱心



讀者，這是他們樂于幫助我的一個重要背景。

每一個受訪者在接受訪問前都清楚地被告知訪問的目的、其談話可能被引入的方式、可能會造成的後果，等等。即，受訪者是在他充分了解研究目的，願為人類性學研究做出貢獻的情況下，成為此研究的志願者的。

我個人的詳細情況，包括家中電話、價值傾向都向每位受訪的志願者公開，以建立彼此間的信任。我同時鄭重地以人格向他們保證，將對他們的個信息嚴格的保密，在我的論文發表之前，他們可以先行閱讀，並有權力要求我對涉及到他們的地方進行修改。

訪談中，我同樣會通過不同的問題檢驗受訪者的陳述，去粗取精。察言觀色同樣是最後的檢證真實性的方法，訪問者時刻留心受訪者瞬間變換的語氣、表情、不同的用詞，等等，將不確定的信息排除。最後，在引用這些訪談材料時，我根據可信度對訪談結果採取“可全面引用”、“可個別引用”、“不引用”三種不同的處理方法。在總計 27 名志願受訪者中，其陳述內容可被充分信任、全面引用的受訪志願者為 17 人（參見附表）。

對由網絡而來的志願者進行研究，同時面對另一個重要的質疑：他們都屬於同類人中那些樂于訴說的，他們是太特殊的，對他們的研究結論是否具有普適性，代表性又有多大呢？由于本研究關注的是多性伙伴行為者和社會控制之間的互動關係，關注的是他們是如何逃避社會控制的。所以，如果說那些志願者可能是性伙伴更多的人，更有勇氣訴說的人，性價值觀更開放的人，這對於此項研究只有好處，正好有助于更充分地解讀研究中將關注的那些問題。正是從這層意義上，通過互聯網獲取的志願者並不會影響本研究的代表性。因為我們關注的不是“面”上的普適，恰恰是極端情況下潛在的規則是如何運作並成為可能的。

2. 分析方法

本文通過分析受訪者自述，解讀社會控制在多性伙伴行為者身上解體的原因。社會交換理論是貫穿始終的、最主要的指導分析的理論。但是，在論述不同的問題時，我也借用了其它相關的理論和研究成果，以輔助社會控制理論來共同解讀。這些理論是：

a. 在對單位控制力的解體進行分析時，以往關於單位制的研究，以及對社會轉型期再分配機制與市場機制的研究，都成為指導分析的重要綫索；

b. 性脚本理論的引入，以及對它的豐富，同樣是爲了說明社會控制在社會轉型期與個人行為的交換關係的破損。爲了證明這一點，又借用了布迪厄關於場域與慣習的論述來輔助；

c. 在進行最後的總結時，我又試圖將討論引深到國家與市民社會、公領域與私領域這樣一些話題上，從而對多性伙伴行為者的增多有更深入的理解。

正是因爲在不同的章節中借用了這些不同的理論與觀點，才使得貫穿全文的用社會控制理論進行的分析得以深入和擴展。

11

第二章 控制的喪失與持續 交換及其背后的博弈

考察當前中國對多性伙伴行為者的非正式社會控制，應該從分析工作場所、家庭、社區三個組織的控制力的變化入手。通過對受訪對象陳述的分析，我得出下面這些具體的印象：

1. 當前中國的工作場所應該分爲市場機制下的工作場所與再分配機制下的工作場所二類。市場機制中的多性伙伴行為者不再擔心工作場所對他們私人生活的影響，或者略有擔心但其交換價值已不足以使他們放棄多性伙伴的生活方式。





與此同時，再分配機制中的人的顧慮則要重一些，中國特色的“單位制”對私人生活的影響在這裏仍然可見其余威；

2. 來自出生家庭的對多性伙伴行爲者的干預或稱控制基本解體了，但來自婚姻家庭方面的控制，仍然是多性伙伴行爲者十分顧忌的；

3. 居住社區，包括非職業社交社區，對私人性生活的控制徹底解體了，但當與婚姻家庭的控制聯合起來時，仍會發生一定作用。

第 1 節 工作場所：單位制、再分配機制與市場機制

12 對美國人性行爲進行非正式控制的組織裏不包括他們的工作場所，但我們研究中國的情況必須提單位，因爲中國的單位不同于西方的工作場所（workshop），後者是在高度發達的社會分工基礎上形成的相對固定的專業化的工作場所，而單位制（Danwei system）中的單位組織不僅有專業功能，而且具有經濟、政治、社會等多方面的功能，起着政府的作用。人們從生老病死到“吃喝拉撒”的全部生活內容都與單位緊密相聯，也就是說，當單位爲單位中的個人提供其所需的時候，也就與個人建立起了密切的交換關係，從而實現了單位對個人的控制。

“單位成了城市社會基本的穩定的利益共同體。單位這種全方位的利益給予造成的直接結果是單位成員對單位的高度依賴。國家政權便通過隸屬於它的單位對其成員利益的支配而實現了對這部分社會成員的行爲引導。單位成員如果拒絕這種引導，就有可能失去單位身份和相應的利益保障。……單位就不僅能對單位成員進行工作紀律的約束，而且運用特殊的行政權力對單位成員進行全面的強制約束。單位不僅管理單位成員的工作，而且還管理單位成員的社會性行爲，乃至于